

花之安中國女性書寫中的“知識僑易”*

“Knowledge Qiao-Yi” in Ernst Faber’s Writings about Chinese Women

張 斐

ZHANG Fei

作者簡介

張斐，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NG Fei,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Email: zhangfei505@gmail.com

Abstract

The German missionary Ernst Faber, who did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colonial expansion in the 19th century, completed two works on Chinese women with the help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and in-depth observ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With the focus on “Knowledge Qiao-Yi” and the connection of various knowledge production elements such as writers, institutions, and disciplines, we can see changes in Chinese women’s knowledge with Ernst Faber’s text as the carrier. Ernst Faber’s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Chinese women changes the original knowledge production field regarding research methods and writing dimensions. However, it continues the “heresy model”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riting about Chinese women in evaluating their morality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ir issues. This example of “Knowledge Qiao-Yi” demonstrates both the network of Chines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Wester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extensive influence of colonialism within this network.

Keywords: Ernst Faber, writings about Chinese women, knowledge production, colonialism, “Knowledge Qiao-Yi”

一、“知識僑易”的現實前提：花之安的僑易歷程

伴隨着19世紀基督教海外傳教和殖民國家海外擴張的進程，中德之間人員的流動和知識的“變易”快速走出18世紀的相對低潮，以多樣的形式和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直到進入一個加速運動的階段。從僑易學的視角看來，作為來華德意志人中的主要群體，傳教士來華的物質位移清晰可見，其精神漫遊也並非無跡可尋。尤其是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這樣除了直接傳教佈道外，還潛心鑽研、筆耕不輟的傳教士。花之安於1865年由巴勉會^①派遣到華，1899年在青島辭世。在華三十餘年間，花之安著述頗豐，除了神學著述和基督教宣傳物，還有大量介紹儒學、中國社會和歷史文化的著作（多以英語或德語撰寫），以及以西方為樣板分析中國各類社會問題的著作（多以中文撰寫）。總體看來，花之安的研究可謂兼及東學西傳和西風東漸，無怪乎他在當時即被譽為19世紀“中國歷史、宗教和文獻研究方面的最高權威之一”^②，當今中西學界的研究也多視其為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關於花之安的宗教思想、中國社會研究和儒學研究，中西學界已有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對於他的兩本有關中國女性的專著，學界研究暫付闕如。

傳播基督教作為傳教士遠赴海外的根本使命，決定了傳教士僑易活動的主要場域在宗教領域，但傳教士活動引發的僑易現象自基督教

*本文為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十四五”教學改革項目“非通用語種人才國際傳播能力培養的路徑探索——以我校德語新專業特色化建設為例”（項目編號：jg20220226）的階段性成果。[This paper is a part of the project “A path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non-general language talents: An examp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erman major” supported by Foundation of “14th Five-Year Plan” Teaching Reform at Univers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Project No.: jg20220226).]

^① 新教傳教會，德語名稱為“Rein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1828年建立，1847年起在華傳教。

^② “In Memoriam. Dr. E. Faber,” *Chinese Recorder*, no.30 (1899): 581.

海外傳教的開端就包含了其他組成部分，譬如對傳教對象國家的社會調查和民俗報告，往往具有跨文化感知和知識生產的性質。花之安來華之初主要在廣東東莞地區傳教。19世紀80年代初，由於傳教會內部的紛爭，花之安脫離巴勉會，短暫返德後，輾轉於中國內地和香港，直至1885年加入同善會^①並遷居上海。來華及由粵入滬，對花之安來說不僅是空間位移或曰自然地理位移，更為根本的是人文地理意義上的巨大改變。^②在首次來華到入滬之前的二十年間，花之安已經完成為數不少的著述^③，但加入同善會和駐滬無疑是花之安僑易歷程中的重要事件。同善會是德國第一個自由主義神學原則指導下建立的傳教會，不同於此前來華的其他新教傳教會，同善會不以直接吸收更多教徒為目標，而是以文化傳教為重，要求其傳教士具有較高學識，以文字和教育工作“在非基督教民族中傳播基督教宗教和文化，並與他們中已經存在的真理要素相聯繫”^④。加入同善會促使花之安在華工作重心從直接佈道轉向文字傳教，也極大地拓展了其著述涉及的領域。

彼時作為自由傳教士已有五年的花之安成為同善會在華第一位傳教士，翌年即赴上海。^⑤上海作為當時中西方知識精英的聚集地，為花

^① 新教傳教會，德語全稱“*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簡稱AEPMV，1884年成立於德國魏瑪。

^② 參見劉春勇：《僑易學與位移理論——現代文學中僑易學的兩種經典類型及其案例》，載《僑易》第2輯，葉尚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87-294頁。[LIU Chunyong, “Kiao-Iology and The Theory of Position-moving: The Two Classic Types and Its Cases of Kiao-Iology in Modern Literature of China,” in *Kiao-Iology*, Vol. 2, ed. YE Ju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5): 287-294.]

^③ 參見張碩：《花之安在華傳教活動及其思想研究》，北京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第8-17頁。[ZHANG Shuo, “Ernst Faber zai hua chuan jiao huo dong ji qi si xiang yan jiu (A Study of Ernst Faber’s Missionary Work and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PhD diss., Peking University, 2007), 8-17.]

^④ Ursula Ballin, “Protestantische Chinamission und Alltagsleben deutscher Missionare in Qingdao (Tsingtau), 1897-1914,” in *Deutsche und Chinesen in Tsingtau, 1897-1914*, eds. Hermann J. Hiery und Hans-Martin Hinz (Berlin: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1999), 91. 本文使用的譯文，如無特別聲明，皆為作者所譯。

^⑤ See Gerhard Rosenkranz, “Faber, Ernst,”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4 (Berlin: Duncker und Humboldt, 1959), 718.

之安帶來了寬闊的知識視野。在上海與中國士人和英美傳教士的密切交流不僅幫助花之安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①，也促使花之安開啟了他文字創作最高產的時期。^②就花之安關於中國女性的研究、著述，以及著作的最終出版看來，加入廣學會是花之安進入相關知識場域的關鍵契機。作為一個由西方知識精英主導的文化機構，廣學會自創立起就將中國婦女問題作為關注的焦點之一，並且通過翻譯和出版婦女書刊的方式宣傳女性解放思想。^③花之安隨來華而獲得觀察中國社會的機會，隨在華傳教的實踐而加深對中國社會的認識，隨駐滬和加入廣學會而觸發了對中國女性問題的研究興趣，通過深入研究中外文獻完成了有關中國女性的知識積累、分類和加工的過程，最終以英文和德文著述，參與了中國女性知識在德意志及西方社會的生產和傳播，實現了一場跨國、跨文化，嚴格意義上也是跨領域的“知識僑易”。

二、“知識僑易”的物質載體：花之安的中國女性書寫文本

花之安對中國女性的關注由來已久，早在1877年經由教會出版的德文著作《中國圖冊 I》^④一書中，花之安就收集了四張包含中國女性的圖畫，並分別附以文字介紹。^⑤這是已知19世紀來華德意志人文

^① See Albert Wu, “Ernst Faber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ure: A Study of a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Missionary in China,”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7, no.1 (2014): 22-23.

^② Ibid., 2.

^③ 徐曉雲：《廣學會出版婦女圖書研究》，上海師範大學2021年碩士論文，第9-14頁。[Xu Xiaoyun, “Guang xue hui chu ban fu nü tu shu yan jiu (A Study of Women’s Books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Master thesi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21), 9-14.]

^④ Ernst Faber, *Bilder aus China I* (Barmen: Verlag des Missionshauses der Rheinischen Mission, 1877).

^⑤ 四張圖分別是一位富家太太（文字關於中國女性的衣飾和纏足習俗）、兩位結伴去寺廟的婦女（文字關於中國婦女求子、算命等活動）、一對母女（文字關於溺嬰、纏足、女童教育和女童買賣）、一個船民女孩（文字關於船民的偶像崇拜和船民女性的勞動生活）。參見Faber, *Bilder aus China I*, 26, 30, 34, 38。

本中最早以圖文結合的形式呈現中國女性的著作。

在其最具影響力的漢語著作《自西徂東》中，花之安曾論及溺棄女嬰和纏足等中國女性問題。^①他反對纏足這種刻意而為的審美追求，着重強調其對女性健康的損害，且認為纏足限制了女性的勞動能力，是導致中國社會落後的原因之一。而對於溺嬰這樣嚴重違背基督教道德的行為，花之安更是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1889年，花之安的著作《中國女性的地位》^②面世，這是第一部來華德意志人撰寫的以中國女性為主題的專著。該書先以英文出版於上海廣學會，隔年被譯為德語，刊於德國的傳教學期刊。^③在該著中，花之安摘引《禮記·內則》的數十個段落和《詩經·小雅·斯干》的第七至第九章作為中國典籍中展現古代女性觀的代表，摘引《大清律例》涉及女性的規條說明中國女性的法律地位，摘引《功過格》^④關於女性的條目代表中國民間宗教的女性觀。花之安分別對這三部分加以評註，批評溺嬰、纏足、納妾制等女性問題及其背後的思想、法律和宗教因素。

花之安的第二部以中國女性為主題的專著《中國著名女子名錄》^⑤也極具代表性。該書同樣由廣學會出版，內容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

^① 參見【德】花之安：《自西徂東》，“禮集”第三十七章“實保原質論”，“義集”第二十五章“禁溺女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78-81、120-122頁。[Ernst Faber, *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78-81, 120-122.]

^② Ernst Fabe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Shanghai: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89).

^③ Ernst Faber, “Die Stellung der Frauen in China,”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no. 6 (1891): 89-101, übersetzt von F. Bahlow.

^④ 《功過格》是古代人用於記錄和評價自己言行中的善惡功過的小冊子，曾被道士用於日常行為的自我約束，後流傳於民間。花之安將之歸為宗教讀物，認為它能反映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和宗教觀念。這裏花之安列舉了《彙纂功過格》和《仙佛真傳章句直解》兩種類型。參見Ernst Fabe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17.

^⑤ Ernst 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Shanghai: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90).

題為“官方認定的著名女性”，分析了女性被予以官方表彰的三類情況，其中引用6則載於《京報》的婦女表彰公告^①，批判中國人以貞節牌坊表彰女性道德的做法是“用社會體系殺死女人，然後再裝飾她們的墳墓”^②；第二部分題為“民間流傳的著名女性”，詳細梳理了二十餘部涉及中國女性的漢語書籍^③和四種西文書刊^④，按16個類別，介紹了66位中國女性及女性鬼神^⑤，堪稱古今中外有關中國女性的文獻綜述；第三部分題為“中國婦女中的基督教工作”，指出通過佈道、教育、醫療、慈善和文字工作促進傳教的必要性和具體方式。

從東西方“知識僑易”的歷史看，自16、17世紀來華耶穌會士起，基督教傳教士就是歐洲中國知識僑易的主要行為體。這種知識生產傳統延續到19世紀，花之安的中國女性書寫正是在這一層面上的重要實踐。可以看到，深厚的漢學學養為花之安的女性書寫拓展出廣闊的視野，他筆下的中國女性並非一個界線清晰的書寫對象，而是涉及儒家思想、傳統宗教、法律、道德倫理規範和歷史文化傳統等複雜面向。尤其是花之安的兩部關於中國女性的專著，已經形成了一個由現實維度和歷史維度

^① 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5-7.《京報》(*Peking Gazette*)指清朝政府專設機構謄抄諭旨、奏摺等官方信息而成的讀物。《京報》既作為中央和地方官邸的內部資料傳播，也作為官方資訊在民間銷售。某些外文報紙常轉刊《京報》的內容，比如花之安對《京報》的引用部分直接來自京報，部分來自《北華捷報》和《字林西報》對《京報》的翻譯。

^② Ibid., 3.

^③ 主要有《列女傳》《歷代名媛圖說》《古今圖書集成》《宮闈文選》《歷代名媛尺牘》《芥子園畫傳四集》《女四書箋注》《幼學故事尋源》《無雙譜》《典故古列女傳》《閨門女訓》《女兒經》《繡像封神演義》《大悲神咒》《淞濱花影》《海上中外青樓春影圖說》等。參見Ernst 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9-15.

^④ 即漢學家梅輝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的Chinese Readers Manual(《中國讀者手冊》)、湯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的Hua-tsien,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花箋，中國求愛詩》，即湯姆斯英譯的《花箋記》)、Rev. James Summers著The *Chineses and Japanese Repository*第1卷和第2卷，以及The *China Review*(《中國評論》)第6卷。參見Ernst 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15-16.

^⑤ 這16個類別分別是孝女、勇於奉獻的姐妹、年輕女子、妓女、美女、皇后、賢妻、壞妻子、好母親、壞母親、寡婦、女詩人、女藝術家、女工匠、超自然女性(指女鬼和仙女)及中國人供奉的女神。參見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16-56.

並列構成的書寫框架。花之安在歷史維度中基於儒家經典、女教書籍、中國文學著作和西方資料介紹中國人的女性觀和中國歷史上的女性，在現實維度中介紹各類中國女性問題及其背後的法律、倫理和宗教因素，兩個維度相互支撐，他本人的評價和觀點穿插其中，完成了一個有關中國女性的具有系統性和權威性的知識生產環節。

三、“移交”：花之安中國女性書寫與西方中國知識生產的交互推進

不難看出，花之安的中國女性書寫依靠的是與19世紀中西方知識體系的緊密聯結。通過著作的出版和流通，他又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輸入到西方社會，促進了西方社會中國女性知識的積累，甚至改變了相關知識的體系和格局。也就是說，花之安的中國女性書寫基於知識生產進程而實現，又參與到新的知識生產進程之中，實際上演示了一個“知識僑易”個例與知識生產進程相互推進的“移交”^①現象。

要近距離觀察“移交”的過程，需要進行焦點的切換。當焦點從花之安移到經他書寫所實現的“知識僑易”本身，就不難發現一個如葉雋所論的“交叉系統與立體結構”，在這個系統或結構中，“個體仿佛是多線行道的交叉點……可以以他為中心來觀察事物，也可以將其只視作一種時空隧道中暫時過客，甚至僅將他視作為一個連結”^②。在這一視角下可以看到，隨着時空座標的改變，花之安在西方中國知識生產場

^① “移交”和“移變”兩個僑易學概念參見葉雋：《構序與取象——僑易學的方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49-52頁。[YE Jun, *Gou xu yu qu xiang: qiao yi xue de fang fa* (Constructing Order and Taking Image: The Methodology of Qiao-Yi)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1), 49-52.]

^② 葉雋：《“理論旅行”抑或“觀念僑易”：以薩義德與盧卡奇為中心的討論》，載《僑易》第1輯，葉雋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63頁。[YE Jun, “Traveling Theory or Qiao-Yiing of Ideas: Focusing on Edward W. Said and Georg Lukács,” in *Kiao-Iology*, Vol.1, ed. YE Ju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4), 263.]

域中的位置及其與這個場域中其他要素的關聯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更加靠近這個場域的中心，成為其中重要的連接點之一。那麼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兩個問題：花之安的中國女性書寫具體受到哪些要素的推動？又在哪些維度上對這一場域產生了影響？

促成這一“知識僑易”的動力要素首先是19世紀西方社會對中國女性問題的公眾興趣。在不斷增加的中國遊記和報道中，溺嬰、纏足、納妾等話題已經成為西方對中國社會進行觀察與批評的熱點。同時，歐洲各國女性運動不斷對傳統的道德倫理體系發出挑戰，引發全社會對女性地位的關注和思考，東方女性的地位和東方人的家庭倫理觀念也成為歐洲讀者的興趣所在。隨着西方殖民進程的推進，這種讀者期待作為一種市場利好，同樣激發了來華的德意志人對這一主題的書寫。各類身份的書寫者中，傳教士本身就肩負着向派出機構及德意志社會介紹中國社會文化的工作內容，目標是向傳教會的本土資助者證實海外傳教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中國女性的處境刺激着傳教士及本國社會基督徒的救贖心理，“纏足”、“男女大防”等習俗和道德規範則直接阻礙傳教工作的進展。因而，中國女性在19世紀成為德意志傳教士中國報道中的重要主題之一。

花之安的中國女性書寫還與漢學和民族學兩個學科的發展相關。19世紀中期，德意志漢學仍延續着歷史上圍繞中國古代典籍進行漢學研究的傳統。真正開始關注中國現實社會的是19世紀來華德意志人中湧現出的漢學學者，他們的書寫和研究“引起了德國漢學從書齋走向當代的轉向，而當代史在這之前一直是為漢學家所不齒的”^①。作為來華傳教士的花之安通過系統深入的中國女性書寫展現中國社會的現實面

^① 李雪濤：《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52頁。[Li Xuetao, *Ri'er man xue shu pu xi zhong de han xue: Deguo han xue zhi yan jiu* (Sinology in the Genealogy of Germanic Scholarship: A Study of German Sinolog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52.]

貌，正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縮影。不同於漢學的緩慢轉向，此時德意志國家的民族學研究已經把目光投向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非西方族群的社會現實，將其種族特徵、民族遷變、社會風俗、宗教活動及生活方式等內容納入了研究視野。民族學學科的進展建構了德意志知識界對中國民族特點、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等現實層面的研究旨趣，但直到1881年，“只有那些打趣的探險報道中的介紹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奪人眼球卻很粗略的中國掠影，而德語書籍裏還沒有值得一提的關於中國的民族誌學研究”^①。花之安的兩本有關中國女性的專著都在19世紀80年代末出版，顯然與德國民族學的發展，尤其是民族學研究興趣的興起和對一手資料的迫切需求直接相關。

在花之安女性書寫的文本內部也能看到這一“知識僑易”與此前數百年西方中國知識積累的緊密關聯。從信息來源上看，花之安廣泛利用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和翻譯成果。除了著作中羅列的西方文獻來源，他還藉助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翻譯對照原文研讀《詩經·小雅·斯干》《禮記·內則》等儒家經典^②，剖析中國的女性倫理規範，引用翟理斯所譯《聊齋志異》中《金姑父》和《褚遂良》兩個故事^③介紹中國女性鬼神，參考歐德理（Ernst Johann Eitel, 1838-1908）對觀音的介紹。^④從內容和主題上看，花之安文本復刻了溺嬰、纏足、多妻制、童養媳、包辦婚姻、重男輕女、女性自殺等此前西方文本中已經形成的有關中國女性的“套話”或符號，繼承了西方對於中國女性的知識生產傳統。

花之安女性書寫對這一知識場域的影響同樣是多維度的，其中最大突破首先是對中西文獻材料所做的系統梳理和研究。目前看來，花之

^① Leopold Katscher, *Bilder aus dem chinesischen Lebe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Sitten und Gebräuche* (Leipzig und Heidelberg: C. F. Winter'sche Verlagshandlung, 1881), Vorwort, 8.

^② See Wu, “Ernst Faber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ure,” 14.

^③ See 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52-55.

^④ Ibid., 55.

安兩部關於中國女性的專著是來華德意志人文本中最早利用中國典籍和法律條文論述中國女性地位的成果。藉助西方漢學幾個世紀的漫長積累和來華後的深入研究，花之安獲得了從中國歷史和中文書籍中探尋中國人女性觀的知識基礎，促使其書寫內容的信息量和論述的權威性大大超越了此前僅憑直接觀察甚至是道聽塗說就對中國女性地位進行評述的文本。花之安的書寫還大大拓寬了西方認知中國女性的框架。前述在西方來華者文本中往往僅作為東方異域風情的“佈景”而被提及的中國女性問題，被花之安放置於整個中國的社會體系和歷史文化中進行分析和批判。比如對於女性守貞自殺，花之安認為，“自殺被視為維護名譽的行為。這種邏輯能夠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病態的社會狀況。更過分的是，這種邏輯除了在某些情況下也適用於官員之外，從不適用於男人。”^①《京報》的表彰和貞節牌坊意味着“中國的官方和帝國權力機構公開地讚揚和鼓勵這種犯罪，表明中國的社會生活處於極其惡劣的墮落狀態”。^②在批判的同時，花之安藉助豐富的資料研究探尋中國人女性觀的深層特徵，也是一種對中國民族心理的觀察：

“在‘妙’這個字的解釋裏，馬禮遜博士在其字典裏寫道：‘中國人告訴我們，女人是造物之中最迷人、最絕妙的。’但另一方面，中國有句諺語：‘青蛇竹兒口，黃蜂尾後針，二者皆不毒，最毒婦人心’。有九個女性從事的行當被認為是非常惡毒和道德敗壞，即‘三姑六婆’……。”^③

“讀者必須記住，大多數故事都是由不同的中國作家以不同的方式改編的……這些故事本身就是一面鏡子，毫

^① See Ernst 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3.

^② Ibid., 5.

^③ Ibid., 此處應指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編撰的《華英字典》。

不掩飾地反映了中國人對女性的心態。它們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也絕對是重要的一部分。”^①

此外，花之安書寫中標註文獻出處、人名、書名，甚至典籍原文的漢字和發音等等做法，在其同時代的西方中國報道中實屬超前。這些向現代學術規範靠攏的寫作方法，能夠使文本信息變成可歸納、可檢驗的內容，是知識標準化的重要手段。從文獻研究、實地觀察，到學科方法的運用，花之安的女性書寫文本超越了此前該主題下的文本，不僅具有為德意志及歐洲社會提供資訊的功能，在某種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種漢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實踐。

花之安的女性書寫“致力於發現和形成新的知識成果”^②，促進了有關中國女性知識的積累和深化，佔據了知識場域中的重要位置。由此產生的影響直觀地體現在花之安與其後書寫者的文本關聯上。從花之安開始，此後的來華德意志書寫者，如作為德意志銀行代表來華考察的恩司諾（August Heinrich Exner，生卒年不詳）、翻譯員和漢學家阿恩德（Carl Arendt，1838-1902）、駐華公使巴蘭德（Max von Brandt，1835-1920）等，都採用與花之安相似的文獻材料和論述角度，就中國女性這一主題有所著述，比如巴蘭德著作《中國風俗畫卷：女孩和婦女》^③對褒姒等古代女性的介紹、對《列女傳》和《女戒》的介紹以及對《詩經》和《禮記》的大篇幅引用等，都與花之安基本一致，該著附錄更是完整收錄了花之安《中國婦女的地位》中近20條法律條文和功過格的相關內容。而花之安文本的深層影響，即

^① See Ernst 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16.

^② 【美】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1頁。[Burton Clark,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rans. WANG Chengxu et al. (Hangzhou: 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

^③ Max von Brandt, *Sittenbilder aus China. Mädchen und Frauen.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Stuttgart: Verlag von Strecker und Moser, 1895).

在這一知識場域帶來的“質變”，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可以確定：其一，不同於歌德筆下的“中國女詩人”、席勒筆下的“中國公主”等文學世界的中國女性形象，花之安的知識加工以其在華者的身份和經驗為前提和基本特點，文本也被西方讀者視為親歷者的中國報道。這意味着，花之安文本在書寫者的知識加工和讀者的知識接受兩個環節都從想像世界轉移到了現實世界。其二，不同於此前大量中國遊記中僅作為異域景觀偶爾出現的中國女性掠影，花之安在對社會、宗教、倫理、法律、歷史、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綜合研究中書寫中國女性，甚至可以說，中國女性成為一個介紹、分析乃至研判整個中國和中國人的書寫主題和研究對象。因此，花之安文本將中國女性知識在西方的中國知識中的位置從邊緣推向了中心。其三，花之安依靠古今文獻資料的研究、長期的觀察和符合學術規範的寫作方式，實現了對中國女性知識的學術化加工，使以往停留在大眾日常知識領域的中國女性知識獲得了進入西方漢學、民族學等學科的可能。

四、“移常”：花之安中國女性書寫中的“異端模式”

不容忽視的是，花之安對法律、典籍等材料的選取具有選擇性和傾向性，對中國女性和中國人女性觀的評論更完全站在基督教傳教士的立場上，以中國人的皈依為唯一目標：“所有的努力都將指向一個目標：靈魂的轉化”^①，“對中國女孩和婦女的教育，除了使她們逐漸達到基督教生活的標準之外，別無其他目的”^②。儘管花之安從中國的宗教、法律、歷史、習俗等廣闊的層面討論中國女性的地位和處境，但他得出的結論卻是絕對化的，認為中國女性是絕對的受害者，“只有福音才能把中國婦女從眾多迷信的枷鎖中解放出來”^③。花之安強

^① 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59.

^② Ibid., 60.

^③ Ibid.

調中國女性與基督教女性之間存在着難以彌合的差距，“必須警告中國婦女不要有這樣的錯覺，以為成為基督徒後，她們就能立刻變成淑女，或多或少地像她們的女教師（指女傳教士）一樣，或者她們可能立即採用她們在外國基督徒中看到的西方習俗”^①。《中國著名女子名錄》羅列的女性類別中，有武皇后、班昭等女作家，螺祖、黃道婆等女工匠，還有蔡文姬、趙飛燕等女藝術家。這些女性的才華、技能和成就，與西方已經形成的中國女性不受教育也無勞動技能的觀點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打破了以往西方報道中單一的、群像化的中國女性受害者形象。然而，花之安以基督教推崇的女性榜樣為標準，對其逐一介紹的66位中國女性及女性人物做出了這樣的總結評價：“她們沒有為在本國人和野蠻的鄰國中傳播她們的信仰（儒教、佛教或道教）做任何事情。……這些故事都沒有指向精神上的安慰，也沒有指向對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在目前情況下，中國婦女不能對中國社會生活產生淨化作用。”^②

“中華歸主”是來華傳教士身份建構的根本利益，這不僅決定了他們書寫中國女性的話題選擇，也決定了他們對中國女性的認知模式和價值評價標準。“異教徒”（Heiden）是“對所有處於自己宗教傳統之外的‘其他人’的統稱”^③，是宗教史中的類別詞匯。在歐洲中世紀，“異教徒”主要用於以一神論為標準稱呼所有不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人，之後逐漸被基督教用來劃分基督徒和所有非基督徒。尤其在基督教向重新發現或新發現的非洲、美洲和亞洲大陸傳教的過程中，該詞在傳教的涵義上得到強化^④，附加了宗教歧視的意味。從來華傳教士以基督教為中心的角度看，中國無疑是異教大國，

^① Faber,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62.

^② Ibid., 9, 57-58.

^③ Kocku von Stuckrad, “Heidentum,” in *Enzyklopädie der Neuzeit*, Vol. 5 (Stuttgart: J.B. Metzler Verlag, 2007), 296.

^④ 例如，1908年之前，巴陵會的全稱即“促進異教徒中福音教傳教的協會”（Gesellschaft zur Beförderung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en unter den Heiden）。

書寫中國時對該詞的使用不僅是一種距離化、他者化的手段，也向讀者暗示着中國宗教乃至中國文化的卑劣和墮落^①。這種以是否信仰基督教作為不同文化的界線、以基督教標準作為不同文化的評價標準的認知慣性和思維底色，可稱為“異端模式”^②。早在16、17世紀來華耶穌會士的書寫中，中國女性的受害者形象已經出現，她們已經被視為亟待基督教拯救的對象。儘管花之安做了超越前人的、深入系統的文獻研究，運用了具有現代學科性質的視角和方法，卻毫無變化地延續了這種“異端模式”，得出了與數百年前相同的結論。“異端模式”局限了書寫者的視野和思想深度，不斷加深偏見，從書寫中異化出一種文化關係上的支配性^③，導致其難以做出客觀全面的結論，更勿論展示中西文化的相通或相似。這不僅使花之安的“學者風範及文化著述水準打上折扣”^④，也令其書寫融入到整個19世紀西方對華殖民書寫之中，以文明進步敘事之名為來華殖民活動增添了“合法性”。

花之安建構其女性書寫邏輯的利益動機不僅在於中國的基督教化，還指向教會在歐洲社會的需求，即在歐洲維護基督教道德體系，為基督教倫理進行辯論。在歐洲“引導基督徒走上道德之路是他們的責任，由於女人在社會和政治上地位變得重要，教會竭力把她們變成

^① 參見孫立新：《從中西文化關係角度看19世紀德國新教的中國傳教》，《文史哲》，2003年第5期，第40-47頁。[SUN Lixin, "The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in 19th Century in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 Cultures,"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no. 5 (2003): 40-47.]

^② 單波、王媛：《跨文化互動與西方傳教士的中國形象認知》，《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1期，第5-25、126頁。[SHAN Bo, WANG Yuan,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Foreign Missionaries' Image Perception of Chin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o.1 (2016): 5-26, 126.]

^③ 參見單波：《面向跨文化關係：報道他者的可能性》，《新聞與寫作》，2020年第3期，第5-9頁。[SHAN Bo, "Towards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The Possibility of Reporting on the Other," *News and Writing*, no. 3 (2020): 5-9.]

^④ 孫立峰：《評傳教士漢學家花之安的漢學著述》，《德國研究》，2012年第3期，第89-97頁。[SUN Lifeng, "Commentary on the Sinology Writings of the German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Ernst Faber," *Deutschland-Studien*, no. 3 (2012): 89-97.]

它的工具，所以這個責任就更加迫切”。^①這就不難理解，為何花之安在中國女性書寫中直書針對歐洲女性的基督教勸誡。他在介紹纏足後寫道：“有着健全的雙腳並願意自己走路的人要為此感謝親愛的上帝”^②，“信仰基督教的女孩們，不要忘記感謝上帝給你們的好。你們要感謝福音，所以你們應熱愛福音，也真正地熱愛救世主”^③。只有將中國女性的艱難處境全部歸因於缺乏基督信仰，將改變中國女性處境的唯一辦法論證為基督信仰，才能論證基督信仰在歐洲的不可替代。所以，一個作為絕對受害者、亟待基督教解救的中國婦女形象也是傳教士捍衛基督教的武器，“異端模式”不僅是傳教士難以逾越的思維慣性，也是目的明確的寫作手段。

無論是長期的社會觀察，還是現代學科的研究方法，以及豐富的文獻研究，都沒有消解“異端模式”和殖民主義對花之安中國女性書寫的塑造。在“異端模式”的主導下，花之安中國女性書寫中歷史維度的拓展和中國典籍的引用，更“有效”地論證出，中國女性地位之低下、女性觀念之落後，不僅是社會上直觀可見的現實，更是根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思想之中、歷經數千年不曾改變的、有典籍為證的真實歷史。“基督教——異教”的二元對立、文明的等級劃分等觀念和思維幾乎是19世紀後半葉西方中國知識生產場域中的時代精神。花之安不僅身處這一場域之中，還積極尋求其中的關鍵位置，因此他對材料的分揀、對中國女性問題的分析、對中國女性和中國人女性觀的評價，都一以貫之地受到“異端模式”的支配，顯示了“知識僑易”中“移常”的一面。

^①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鄭克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677頁。[Simone de Beauvoir, *Le Deuxième Sexe*, trans. ZHENG Kel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4), 677.]

^② Faber, *Bilder aus China* 1, 27.

^③ Ibid., 35.

五、“易”的實質：殖民主義的知識生產網絡

花之安的中國女性書寫儘管是西方中國知識生產的微觀案例，但見微知著，反映出的是西方學者、機構、學科等主體對中國女性這一主題下知識生產的共同視域、共同協作和西方讀者的共同興趣。學者、機構、學科和新的知識生產空間在知識僑易的過程中相互連接，共同促成知識成果的積累和變化。作為一個“知識僑易”的案例，花之安的女性書寫既處於德國在華殖民擴張的歷史背景之中，又與德國相關機構、學科等多方的發展變化密切關聯，是近代德國對華殖民主義知識生產進程的縮影，其中的“移交”和“移常”反映出的“易”的實質，是19世紀西方中國知識生產的兩個特徵：一是知識生產由不同主體在具有延續性的知識生產進程和相互交織的知識生產網絡中共同推進，二是殖民主義對知識生產各要素和各環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世紀踏上中國土地的德意志人，儘管在職業身份和個人興趣方面存在差異，但一旦謀求書寫的權威性和說服力，都或多或少地受新興的人類學、人種學、地理學、民族學、社會學等西方現代學科的規訓。這種影響首先反映在花之安對這些學科的成果、概念和方法的有意無意地借鑒上。中國女性書寫文本是中國女性知識生產的載體和成果，花之安對中國女性相關知識進行排序、編目、分類和系統化，使之變成德意志及西方讀者和學術界可以迅速把握和管理的知識，進而，無論是對於後續來華的外交人員、傳教士和商人，還是對於德意志的學者，這些知識都成為其認知和行動的基礎。不管書寫者主觀上如何看待其書寫，從他們運用實地觀察、使用中國文獻、記錄細節和原文等方法看，這些女性書寫都屬於對現實中國進行系統科學分析的開端。

但與這種趨向於客觀嚴謹的學術化書寫同時存在的，還有滲透在文本內外的殖民主義要素。隨着西方各國掀起的殖民浪潮，德國也在

1884年獲得了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德屬西南非。這一進程無疑刺激着德國社會對遠東的興趣。再加上世紀末出版業的繁榮，有關中國的書籍迅速豐富起來，以至於到1891年，阿恩德已經認為：“但凡對中國有興趣的人都能輕鬆地從現有的作品中獲得對相關主題的了解。”^① 花之安的女性書寫中生成了一條以女性地位論證中國與西方文明等級差距的殖民主義邏輯鏈，建構出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視野，並將其通過女性書寫文本傳遞給德意志讀者。

殖民主義並非僅在花之安文本中施加其影響，而是廣泛作用於知識生產和流通中的各要素和各環節。“在1884年德國積極加入殖民地收購政策之前，幾乎所有德國傳教士協會的工作都相當平淡。但從1884年起，傳教士協會開始蓬勃發展了數十年。德國海外殖民地的獲得，使更多的人開始關注殖民問題，並視傳教士為德國的文化代表。”^② 而花之安所在的研究和出版機構廣學會，既是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同時也具有明確的政治傾向性，謀求通過思想滲透使中國人歸化西方。^③ 19世紀殖民主義背景下來華的德意志書寫者作為中國知識生產的主體，同屬一個“僑易共同體”^④，其書寫活動折射出的中德文化關係的“制序現象”^⑤，就是德國或歐洲都公開或潛移默化地充當着文明的樣板，用以比較和襯托中國文明的落後和停滯。

^① Carl Arendt, "Die häusli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Stellung der Frauen in China," *Deutsche Rundschau*, Oktober-Dezember (1891): 421.

^② Chun-Shik Kim, *Deutscher Kulturimperialismus in China. Deutsches Kolonialschulwesen in Kiautschou (China) 1898-1914*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4), 113.

^③ 參見程麗紅、劉洋：《晚清政治運動中的廣學會——一個傳播帝國的落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1年第1期，第214頁。[CHENG Lihong, LIU Yang,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in the Political Movement of the Late-Qing Dynasty: The Fall of a Media Empire,"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21): 214.]

^④ 葉皓：《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09頁。[YE Jun, *Bian chuang yu jian chang: qiao yi xue de guan nian* (Creation in Changing and Gradual Constance: The Idea of Qiao-Y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9.]

^⑤ 同上，第91-95頁。

儘管花之安的女性書寫著作本身在過去的百年間幾乎淹沒於知識生產的洪流之中，但在微觀上還原這一知識僑易發生的現場，觀察這一由“僑”致“易”的過程，顯然可以幫助我們捕捉曾在中德文化交往這一立體結構中發揮作用的動力要素，進而對不同文化間碰撞和交流的歷史有更為具象的認識。知識的僑易不僅以一個行為體為唯一載體和動力，它實質上發生在一個由不同行為體、機構、學科等相互聯結而形成的網絡之中。在僑易學視域下考察這些要素的變化及相互關係，既可以在微觀上對知識生產“觀僑取象、察變尋異”，也有助於在19世紀中德文化碰撞的時空維度中觀察“知識僑易”的軌跡，拓寬對中德文化交流脈絡的整體認知。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In Memoriam. Dr. E. Faber." *Chinese Recorder*, no.30 (1899), 581-583.
- Arendt, Carl. "Die häusli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Stellung der Frauen in China." *Deutsche Rundschau*, Oktober-Dezember (1891): 421-441.
- Ballin, Ursula. "Protestantische Chinamission und Alltagsleben deutscher Missionare in Qingdao (Tsingtau), 1897-1914." In *Deutsche und Chinesen in Tsingtau 1897-1914*. Edited by Hermann J. Hiery und Hans-Martin Hinz, 85-113. Berlin: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1999.
- Brandt, Max von. *Sittenbilder aus China. Mädchen und Frauen.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Stuttgart: Verlag von Strecker und Moser, 1895.
- Faber, Ernst. "Die Stellung der Frauen in China." Übersetzt von F. Bahlow.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no. 6 (1891): 89-101.
- _____. *Bilder aus China I*. Barmen: Verlag des Missionshauses der Rheinischen Mission, 1877.
- _____. *The Famous Women of China*. Shanghai: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90.
- _____. *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Shanghai: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89.
- Katscher, Leopold. *Bilder aus dem chinesischen Lebe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Sitten und Gebräuche*. Leipzig und Heidelberg: C. F. Winter'sche Verlagshandlung, 1881.
- Kim, Chun-Shik. *Deutscher Kulturimperialismus in China. Deutsches Kolonialschulwesen in Kiautschou (China) 1898-1914*.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4.
- Rosenkranz, Gerhard. "Faber, Ernst."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 4, 718-719. Berlin: Duncker und Humboldt, 1959.
- von Stuckrad, Kocku. "Heidentum." In *Enzyklopädie der Neuzeit*, Vol. 5, 295-298. Stuttgart: J.B. Metzler Verlag, 2007.
- Wu, Albert. "Ernst Faber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ure: A Study of a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Missionary in China."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7, no.1(2014): 1-29.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程麗紅、劉洋：《晚清政治運動中的廣學會——一個傳播帝國的落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1年第1期，第214-223頁。[CHENG Lihong, LIU Yang.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in the Political Movement of the Late-Qing Dynasty: The Fall of a Media Empire."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2021): 214-223.]
- 【德】花之安：《自西徂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Faber, Ernst. *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 【美】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Clark, Burto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WANG Chengxu et al. Hangzhou: 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1994.]
- 李雪濤：《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LI Xuetao. *Ri'er man xue shu pu xi zhong de han xue: Deguo han xue zhi yan jiu* (Sinology in the Genealogy of Germanic Scholarship: A Study of German Sinolog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 劉春勇：《僑易學與位移理論——現代文學中僑易學的兩種經典類型及其案例》，載《僑易》第2輯，葉尚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87-294頁。[LIU Chunyong. "Kiao-Iology and The Theory of Position-moving: The Two Classic Types and Its Cases of Kiao-Iology in Modern Literature of China." In *Kiao-Iology*, Vol. 2. Edited by Ye Jun, 287-294.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5.]
- 孫立峰：《評傳教士漢學家花之安的漢學著述》，《德國研究》，2012年第3期，第89-97頁。[SUN Lifeng. "Commentary on the Sinology Writings of the German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Ernst Faber." *Deutschland-Studien*, no. 3 (2012): 89-97.]
- 孫立新：《從中西文化關係角度看19世紀德國新教的中國傳教》，《文史哲》，2003年第5期，第40-47頁。[SUN Lixin. "The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in 19th Century in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 Cultures."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no. 5 (2003): 40-47.]
-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鄭克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de Beauvoir, Simone. *Le Deuxième Sexe*. Translated by ZHENG Kel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4.]

- 徐曉雲：《廣學會出版婦女圖書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1年。[Xu Xiaoyun. "Guang xue hui chu ban fu nü tu shu yan jiu (A Study of Women's Books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Master thesi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21.]
- 葉尚：《“理論旅行”抑或“觀念僑易”：以薩義德與盧卡奇為中心的討論》，載《僑易》第1輯，葉尚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58-280頁。[YE Jun. "Traveling Theory or Qiao-Yiing of Ideas: Focusing on Edward W. Said and Georg Lukács." In *Kiao-Iology*, Vol.1. Edited by YE Jun, 258-280.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4.]
- 葉尚：《構序與取象——僑易學的方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YE Jun. *Gou xu yu qu xiang: qiao yi xue de fang fa* (Constructing Order and Taking Image: The Methodology of Qiao-Yi).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1.]
- 葉尚：《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YE Jun. *Bian chuang yu jian chang: qiao yi xue de guan nian* (Creation in Changing and Gradual Constance: The Idea of Qiao-Y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張碩：《花之安在華傳教活動及其思想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07年。[ZHANG Shuo. "Ernst Faber zai hua chuan jiao huo dong ji qi si xiang yan jiu (A Study of Ernst Faber's Missionary Work and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PhD diss., Peking University, 2007.]
- 單波：《面向跨文化關係：報道他者的可能性》，《新聞與寫作》，2020年第3期，第5-9頁。[SHAN Bo. "Towards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The Possibility of Reporting on the Other." *News and Writing*, no. 3 (2020): 5-9.]
- 單波、王媛：《跨文化互動與西方傳教士的中國形象認知》，《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1期，第5-25、126頁。[SHAN Bo, WANG Yuan.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Foreign Missionaries' Image Perception of Chin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o. 1 (2016): 5-26, 126.]